

《循环日报》及王韬报刊思想评析

袁新洁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王韬是我国维新运动兴起前最重要的新闻思想家,他集办报实践家与学者于一身,站在中西汇通的角度上,全面阐述了对新闻事业的认识,对中国新闻思想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维新思想家们的办报理念及办报实践。文章拟以《循环日报》为例,对王韬的报刊思想作简要的评析:一是“四方通达”的新闻功能观;二是“立言求变”的新闻政论观;三是“通才”的新闻人才观;四是“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新闻舆论主权观等。

关键词:《循环日报》;王韬;报刊思想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9)02-0242-05

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该报一改中国传统报刊以传抄上谕、刊载章奏为主要内容的办报方式,而以“立言”为目的,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刊,使中国报刊首次以战斗的姿态介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增强了报刊影响舆论的政治作用,提高了报刊的政治地位,冲破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樊篱,使《循环日报》成为我国第一个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讲坛,成为“文人论政”的最早的尝试。按美国汉学家柯文的说法,“《循环日报》是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管理而取得成功的报刊”^{[1](256)}。王韬也因其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新闻报刊之父”^{[2](11)}。本文拟以《循环日报》为例,对王韬的报刊思想作简要的评析。

一、“四方通达”的新闻功能观

(一) 通内外:“通外情,广见闻”

通内外即“通外情,广见闻”,“博采群言,兼收并蓄”,是王韬对报刊目的功能的最主要认识,也是报刊思想中的重中之重。

1840年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的鸦片和枪炮打开,中外交涉便日益增多。然而,中国的官绅士民对西方的政情民俗,却“多有未明者”^{[3](47)}。王韬对这种情形惴然忧之。他怀着一腔忧国忧民之心,为中国的保商御侮、变法自强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他尖锐地指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舍日

报一途,将何所入门。”^{[4](41-45)}基于此,王韬在《变法自强》等文章及给当时的一些官员的通信中,不厌其烦地论述办日报以“达内事于外”和“通外情于内”的主张。王韬的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不仅远胜魏源的“夷情备采”,而且是中国新闻史上关于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

王韬希望《循环日报》能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以王韬对中学造诣之深、对西学了解之广,实具有沟通中西的良好条件。在这个桥梁上,王韬对“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观念提出了强烈质疑。在“中外新闻”“告白”两个栏目中,王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作了大量的报道,对西方世界进行了超前性的全景式扫描。这种扫描改变当时的人们“甘坐因循,罔知远大”的陋习,使中国人知道“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四书五经之外尚有舆图算术等自然科学知识^{5}。王韬的这种贯通中西的魄力,让中国报刊开始“放眼看世界”,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

(二) 通上下:“下情上闻,仁意下达”

通上下即“下情上闻,仁意下达”,是指皇帝政府与民众舆论之间信息畅通无隔阂。

王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堂廉高深,舆情隔阂”^{[6](65)},这种上下蔽隔的直接后果便是政治腐败、民心涣散,导致中国不能自立,受制于人。而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因为其甲兵精强,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上下相通。因此王韬渴望中国也“上下相通”,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7](24)}“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8](55)}。他主张中国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政

府创办新报，以知地方之机宜，知讼狱之曲直。他还进一步呼吁清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刊，这样，“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相浃洽”。^[9]鉴于此，王韬对民间新闻赋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言论。这类言大至水灾、火灾、饥荒，小之赌博、偷盗、行乞，只要是当时社会生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王韬都能做出反应，并成为《循环日报》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

王韬为了实现报刊“通上下”的机能，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两方面孜孜以求，二者的内容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实在在地走出了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步，并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其它中文报刊的水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王韬评述中外时势和鼓吹社会改良的政论，其思想水平之高，社会影响之大，可谓当时无双。

（三）通易俗：“启民智、辅教化”

文风通俗化是中国报刊文风的关键转变，也是“启民智、辅教化”的关键转变。

《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就在《本馆日报略论》中明确表述，他创办日报的目的之一，便是“俾众生感发善心，消除恶念，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已”^{[4](41-45)}。他希望日报能够成为新的大众传媒的工具，这种大众化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来实现的。首先是语言表达上的“自抒胸臆”，文风的质直朴素。王韬说自己写言论“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矣”，反对“故弄玄虚”“隐晦曲折”和“故作惊人之语”。其次是篇幅大体固定。王韬的政论文体就固定在1 000至1 200字之间。这样固定篇幅，主要出自几个原因，一是要适应近代报刊固定版面的要求；二是为了适应读者的日常节奏；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大地拓展了读者对象，并因此选择不同的表述格式，不分尊卑贵贱地面向不同阶级、阶层、身份、地位、文化、经历等的读者统一，使王韬的现代文体首次借助日报这种大众传媒的威力，开辟了宣传改良变法主张的天地。

报刊不仅给王韬提供了现代性思想的舞台，也有机会让他尝试现代性的表达方式，这种现代报刊政论文体，即后来的社论体，成为了中国人在这一领域里最早的尝试。在中国古代论辩文体向着现代政论散文体转变的过程当中，具有首创之功，沾溉后人，非一代也，致使它如火如荼的燎原开来。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二、“立言求变”的新闻政论观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保罗·科恩曾说，“在中国

近代史的初期阶段，报刊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明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刊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10](149)}

王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多，但内心深处崇尚的仍是“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而“立言”就是王韬认为的国人办报的目的之所在。他在《循环日报》明确宣布要借“日报立言”，也就是说，借报刊这个舆论阵地来宣传变法自强主张。他第一次以政论为武器，让报刊融于政治。同时，王韬又是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要求的报人。他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这篇著名论文中系统总结了现代报馆的职能，其中一条就是，能自由地“直陈时事，无所忌讳，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他还进一步指出“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认为“其言之而可采也，则同于葑菲之不遗；其言之而无足采也，则同于刍狗之可弃，无所谓讪谤也”。^[9]这在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不可不谓惊世骇俗了。他还进一步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舆论自由表现出了由衷的向往之情，他向往在中国大地上，有朝一日也能自由办报，出现“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的局面。为此，他多次提出了放宽言禁、言论自由的要求，并以伦敦的《泰晤士报》为例，“国家大事视其言以别”，说明如果报刊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便能影响事态发展，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权力滥用。王韬的观念虽然用的是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的思考方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近代意义的报业及报刊观念，正是在王韬这些成长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向西看、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近千篇论文，皆以内政外交等重要时事为题材，评论时事政治，鼓吹变法自强，表现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和爱国精神。一般认为，言论特别是政论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循环日报》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杰出报刊。从1874年到1884年10年的时间，王韬用“天南遁叟”“弢园农民”“遁窟废民”等笔名在《循环日报》土发表了《变法》《变法自强》《洋务》《重民》等百篇政论文章，系统宣传了他的“变法自强”的主张。具体而言，王韬的变法自强主张是由“治中”和“驭外”两部分组成的，“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8](20)}。“治中”王韬以为不外乎变法自强。自强首先在于“创设局厂、铸枪炮、造舟舰、遣发幼童出洋，肆习西国语言文字、器艺学术而已”，在这里王韬还特意指出“行之当无徒袭其皮毛”^{[8](20)}当然这还是内政的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求富。王韬以为“富强即治之本也”，“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也”^{[8](36)}。富是强

的基础,富则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王韬提出了开采煤矿、大力新办纺织工业、近代交通工业、设立保险业等建议。“馭外又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8](20)},王韬认为国富民强之后就应该及时开展馭外活动,以争取民族独立。故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设领事》《遣使》《使才》等文章,不但对出使人才做了一定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简公使、设领事的独立外交思想。

《循环日报》的言论特别是政论,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犀利眼光,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一般文人。其政论的特质可用16个字来归纳,即高屋建瓴、经世致用、讲求时效、不拘一格,体现出大处着眼的宏观意识,注重现实的参与意识和不落俗套的开放意识。方汉奇先生评价说:“王韬的政论文章继承了中国历代杰出政论家的优点,同时有自己的风格。他反对‘泥古’,反对‘刻意模仿’,反对把文章写成‘千人一面’。他的政论文章深入浅出,言之有物,雄辩而富于感情,对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报刊政论有很大影响。”^{[11](365)}

三、“通才”的新闻人才观

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

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的“迂才”,^{[8](42)}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輿图算术胥统于此”^{[8](37)}。王韬的新闻人才观,源于他对人才问题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王韬终其一生,几乎没间断过对人才重要性的呼喊。他常说“治国之要,曰举人才,曰固民心”,“国家之有才,犹人身之有精神”^{[8](168-169)}。在王韬看来,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主要是看其人才的兴衰程度。与传统的人才观相比,王韬的人才观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

一是多样化、专门化。王韬强调人才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他的人才观,是以承认人才的多样化、专

门化为前提的。他反对“今日治吏曹,明日治刑曹,未及熟其职事则又转而他”,他认为“才有数等,有吏才,有将才,有匠才,有出使之才,有折冲御侮之才,有明体达用之才,有应急济变之才”。^{[12](278)}而对专门人才的关注是王韬人才观的重心,强调人才的多样性与专门性,是王韬人才观的一大特点。他把人才与求强求富的工商金融、军事国防、科学教育、工程技术等实际专门活动联系在一起考虑。显然,他的人才观与提倡“君子不器”的传统人才观、把是否入仕作为评价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截然不同的。

二是实用性、功利性。王韬认为所要培养的人才,虽然也有几分道德主义的倾向,但最终被他看重的还是实用功利,“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輿图象纬,一切专求于实用”^{[8](141-142)}。他多次对封建顽固派把迂腐虚无的道德放在首位的观点进行抨击,认为当代中国“民富国强”是社会最大目标,一技一才的专家才是真才。在呼吁真才的过程中,他同时又把科举所取之士统斥为伪才,深刻指出社会上“名”与“实”相分离的怪现象。因此,王韬所强调的人才的有用性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所希望的决不只是怀抱利器而终生无所建树的人,而是那些能够确实有用武之地一展抱负的人。

王韬还从报刊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他认为,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在西方,报刊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正因为如此,他提出报刊的主笔应该是知识广博的“通才”,“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不然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他主张对报刊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王韬报刊对于当时新闻界“挟私汗人,自快其忿”的不道德行为,认为“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旧报之通弊”^{[8](171-172)}。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德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此外,王韬把人才观与改革开放思想联系起来,以世界意识和多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才问题。他既承认中国之学,中学之才,也承认西方之学,西学之才。王韬有一句名言,即“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8](121)}。王韬甚至认为,中国现代化急需大批实学人才,中国在国内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妨采取“取材于各国以为我用”的方针。^{[5](8)}王韬的这些人才观,在当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性,深刻的影响了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

四、“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新闻舆论主权观

近代化报业在我国的出现是同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它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活动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报业开始之初,报业主控权还掌握在西人的手中,因为没有经济上的支撑地位,所以话语上的权力自然就被削弱了,甚至到了在自己的国度里日益失去言论的阵地的地步。

据统计,从1860到1890年,基督教系统在中国境内出版的报刊已有76家之多。其创办人或主持人当然也是西人,大权都在他们手中。因而王韬等人痛感每遇外事交涉,西方在华报刊“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入之言之为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王韬认为,“莫若直书中外相涉之事,自我而达之于其国中,则译华事为西文日报者,所以正内情于外也,所谓明敌情者此也”^{[5][5]}。基于此,他们明确提出报刊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观点,主张不能让“外人操笔削之权”,甚至应该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办中文报刊。

在此观点之上,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循环日报》是华人资本渐厚的产物,办报的所有资本全出自华人。因为华人的独立经营让华人利益和立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舆论工具。在《循环日报》创刊之初,王韬便一再地特别强调国人自办的独立性。他宣布:“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是报之行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13]并一再声明:“《循环日报》,……无非为专益华人起见。”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这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发表独立见解的前提。在近代中国,由中国人出资、中国人当主笔、为中国人说话的报刊的问世,是破天荒的事情。

接着,王韬进一步阐发了国人自办西文报刊的益处:“中国既自设西文日报,则可以拾其遗而补充其缺,纠其谬而正其讹,然后事理不至于乖错,即可泯猜贰于无形。就使西报一无错误,而我复重言以申明之,亦未始非互证旁稽之一助,此其利一也。凡中外利病所在,因革损益之所宜,或在事前,或在事后,皆得秉公论断,指陈得失,使彼知孰为不便,因以定从远之准,分取舍之途,则彼此可以免杆格不通之病,此其利二。交涉巨案,兵戎玉帛,情于是系焉。西报苟稍存左袒之心,或措辞之轻重失其宜,叙事之详略失

其当,皆足以激愤而致祸,要之直道自在天壤,吾等据事直书,不以加减臧否褒贬于其间,务使公是公非,灿然大白于天下……此其利三。”^{[5][28]}王韬的呼声在当时是那么“前卫”,犹如空谷足音,直到多年以后,陈衍发表《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王韬寂寞的呼声才得到回响。

此外,为了保证“华人出资,华人操权”,《循环日报》还广泛开展了广告业务及其多种经营之道,以不断夯实“华人操权”的经济基础。由于《循环日报》打出的是“华人出资,华人操权”的牌,王韬利用这一特点,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攻势。其海报上写着“此纸祈贴在宝号壁间为祷”,说明了该报早期宣传手法不仅是免费赠送报刊,在报上大力宣传以及四处发海报,并且还要求华人商家将海报贴在商店墙上。另外,每天还发行“行情纸”,以小张的中国土纸印刷,刊登报刊截稿以后收到的重要消息。《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刊,广告占报刊版面四分之三左右。但是,当时刊登在早期《循环日报》上的欧美船务公司、洋行及药局等广告,并不多见。因为它是打的“华人社会之喉舌”的旗子,所以只能期待“华人之一心一德”的支持,并以此理念招徕广告订户,劝导华人商家在此刊登广告。总之,王韬作为有爱国抱负的报人独立办报,他深刻地意识到在一个以“船”和商业为中心的港口城市,报刊必须通过广告的经营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资本、华人操权”。

参考文献:

- [1] 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和晚清的改革[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2]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M]. Chicago, 1934.
- [3]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 [4] 夏良才. 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J]. 历史研究,1990,(2).
- [5] 王韬. 弢园尺牍(卷八)[M]. 上海:中华书局,1959.
- [6]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7]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上海:中华书局,1959.
- [8]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卷三)[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9] 王韬. 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N]. 申报,1878-02-19(1).
- [10] 张海林. 王韬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K].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 [12] 王韬. 弢园尺牍续钞[M](卷三)[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13] 王韬. 本局布告[N]. 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

Wang Tao's view on journalism through Circulation Daily

YUAN Xinji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deologists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in the history before Restoration Movement in 1898, Wang Tao put all his ideas into the practice of developing newspaper. He was also a scholar.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 points of view, he once introduced his 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m comprehensively, which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for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tic idea in later times and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whole process.

Key Words: Circulation Daily; Wang Tao; view on journalism

[编辑: 汪晓]

(上接 195 页)

正是根据这一法理,对所有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进行区分,从而发展出审查标准的类型化体系。因“人性尊严”已成为当今立宪主义国家共同的核心价值,故这一法理对其他国家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具有借鉴意义。

- ②① 当然,与个人生存和发展相关的基本权利并不能离开具体案情而断然确定,具体案件中受教育权、劳动权或社会福利权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属于这范畴。
- ②② 所谓一般性平等权,是指依附于具体自由权利的实体上,与特定自由权利形成竞合的平等权(如劳动平等权、选举平等权)。具体平等权却并不涉及宪法自由权利,它是政府的特殊分类行为(如以地域、身份或性别等为标准)造成了对特定主体的伤害,因而构成对特定主体的平等权侵犯。

参考文献:

- [1] 伊藤正己. 言论·出版の自由[M]. 东京: 岩波书店, 1969: 24-26.
- [2] 芦部信喜. 宪法诉讼の现代的展开[M]. 东京: 有斐阁, 1981: 70-71.
- [3] 法治斌. 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与其他权利之标准[C]// 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 台北: 月旦出版公司, 1993.

On American double-standard theory

HE Yonghong

(School of Law,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American courts practice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reviewing examinations, and have developed a dual-standard theory. But the structure of the dual-standard is turning to mobility, therefore the legitimacy of the dual-standard claims a new legal theory. China should use the dual-standard theory for reference to construct its own scrutiny standard because it reflects the common human social life experiences and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We can introduce double-standard by the medium of China's constitutional norms to practice our own constitutional review.

Key words: American double-standard theory; constitutional review; structural change

[编辑: 苏慧]